

◀ (上接9版)

照章纳税。鲁迅先生把越界筑路称作‘半租界’，真个一点不错。”

五四运动后，中国共产党成立，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反帝反封建的民族革命运动风起云涌，收回租界和越界马路治权的呼声日渐高涨。

1926年5月，北洋军阀孙传芳任淞沪督办公署督办，宴请各国驻沪总领事及工部局、公董局董董，公开宣布不同意租界界址扩张，也不允许建筑越界马路。接着，收回北四川路一带及狄思威路、虹桥路等处越界马路的警税管理权。领事、美国驻沪总领事克宁翰即向交涉员许沅提出交涉，要求将越界筑路管理权一事与沪上各项悬案一并解决。许沅函复克宁翰表示同意，收回越界筑路管理权一事暂缓进行。同年8月底，许沅向克宁翰提出收回越界筑路管理权的要求。克宁翰复函表示领事团愿就此事与中国政府磋商，并订于

9月15日开始会商。但转而又趁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以“时局不清，前途难测”为由，拒绝会商。

1927年3月，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国民革命军占领上海（华界）。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发表声明，管辖越界马路及附近地段。但工部局毫不理睬，仍继续收取越界筑路地段的巡捕捐。9月初，交涉员郭泰祺致函克宁翰，提出抗议。1928年7月，交涉署与领事团一再交涉，领事团虽表示同意双方就收回越界马路一事进行磋商，但磋商并无进展。1930年6月，国民政府上海市公安局宣布在租界西区外各马路行使职权，克宁翰照会市政府提出责问。1932年4月，上海市政府与工部局各派2名代表，就收回越界马路再次进行会商，仍无结果。

在这样的你来我往中，北四川路越界筑路区的“半租界”身份得以固化，构成一种既不同于华界、又不同于租界的独特社会政治空间。由此，

越界筑路区不仅成为民国初年北洋军阀封建统治的薄弱环节，也成为中国政府、租界当局和各方势力角逐、“过招”的中间地带，进而影响和推动了中国进步文化的策源。

## 北四川路越界筑路区对中国进步文化策源的影响

根据虹口区党史和文物保护单位统计，全区共有革命旧址遗址49处，左翼文化运动重要旧址遗址32处，合计81处。这些与中国革命和中共发展历程密切相关的重要旧址遗址，大多分布在今四川北路和提篮桥北外滩一带。

相比之下，在北四川路越界筑路区，即今武进路以北南北长约2公里、东西宽约1公里的四川北路中北部地区，密集分布着52处重要的旧址遗址、名人故居。其中，既有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左翼作家联盟等重要历史事件的发生地，也有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上海区委（江浙区委）、中共江苏省委、上海总工会等党的重要机关办公场所，更有陈独秀、瞿秋白、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早期共产党人和鲁迅、郭沫若、茅盾、叶圣陶、沈尹默等进步文化名人的工作和生活场所。在这些重要革命旧址遗址发生的人和事，曾经极大地影响了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革命进程，使得北四川路越界筑路区成为中国进步文化的重要策源地。

回望这些历史事件，1925年1月在北四川路西侧淞沪铁路边一座石库门里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背景下，这次大会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并且把党的基本组织由“组”改为“支部”，党的领导人由“委员长”改为“总书记”，明确“党员三人以上得成立一个支部”，不仅有力地促进了工农群众运动的发展，

加快了大革命高潮的到来，而且推动中国共产党实现了脱胎换骨的转变，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从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小团体转变成为真正的群众性政党。

这么重要的大会，为什么不是一大、二大那样在租界里开？而是选择在北四川路的越界筑路区域？据会议亲历者、时任中央宣传部秘书的郑超麟回忆，这幢房子，当时是委托中央宣传部的干事张伯简找来的，找房子地点的要求，是“不能在租界里，又不能离租界太远，以便一旦发现问题，就可立即撤退疏散，往租界跑”。

郑超麟的这段回忆，形象地说明了当时中国的政治局势和虹口北四川路越界筑路区的特殊优势。作为一个以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指导、在秘密状态下开展工作的无产阶级政党，无论在华界还是在租界，都面临较大的风险。而北四川路越界筑路区的“半租界”状态，则为大会的安全召开提供了便利和保障。因此，中共四大在此处召开，会期长达12天，却没有出现任何安全问题。

许多进步人士和左翼作家也把北四川路越界筑路区当作乱世中的避难港湾。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茅盾、鲁迅先后定居景云里。

如前所述，景云里是四川北路附近东横浜路上的一条石库门弄堂。1927年8月，茅盾冒着被国民党通缉的危险，从武汉回到上海，经好友叶圣陶帮助，住进叶家隔壁弄堂最深处的景云里11号半，创作了轰动文坛的《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并且第一次使用了笔名“茅盾”，从职业革命家转变为伟大的文学家。

同年10月，鲁迅携许广平从广州来到上海，原本并未打算久留，结果却是在旅社住了短短5天后，便在三弟周建人所住的景云里租房寓居。直至1936年逝世，鲁迅和家人一直定居在北四川路越界筑路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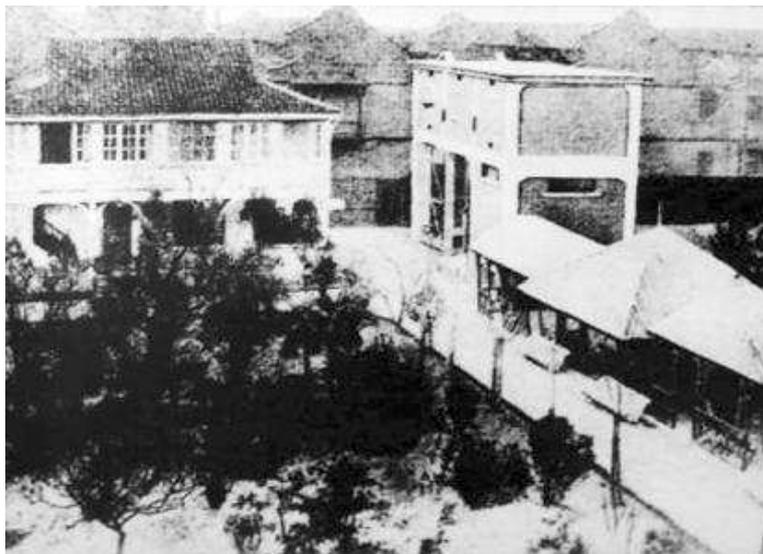
茅盾回忆这段危险时期时说：“我隐藏在我家（景云里十一号甲）的三楼上，足不出户，整整一个月。当然，我的‘隐藏’也不是绝对的，对于住在同一条弄堂里的叶圣陶、周建人我就没有保密（那时叶圣陶住在我的隔壁，周建人又住在叶圣陶的隔壁）。十月份鲁迅从广州经香港来到上海，也搬到景云里，我也没有对他保密。”

由此可见，北四川路地区之所以会成为中国进步文化的重要策源地，越界筑路区特殊

北四川路地区是中国进步文化的重要策源地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四川路西侧淞沪铁路边一座石库门中召开。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总指挥部商务职工疗养院



▲北四川路安慎坊中央宣传部旧址

▼红色学府上海大学

